

# 柯尔贝尔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及其实践

陈旭东

柯尔贝尔是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重臣，他的经济思想与政策实践有着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是17世纪后半叶晚期西欧重商主义的一支重要脉络。柯尔贝尔经济思想的基本原则是，以贵金属形式存在的财富是国家繁荣和强大的唯一基础，他在产业政策和对外贸易方面的众多改革探索都围绕着这一基本原则展开。

柯尔贝尔 (Jean-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 是法国路易十四时期最有作为也是对这一专制王朝的鼎盛贡献最巨的重臣。1660年代起，柯尔贝尔在路易十四王朝统治体系中曾主管财政、商业、建筑、海军等多个部门，其中最重要的要属1665年开始担任的财政总监督一职，在此职位上他实际上掌管了王朝的全部内政事务，并致力于最大限度地促进法国的经济繁荣和财政收入增长，以此为路易十四的对外战争及王室开支和统治提供必需的资源支持，为此他对经济发展采取了突出的国家干预政策。在这一点上，柯尔贝尔与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时期的股肱之臣桑弘羊的角色有一定共同之处。

在柯尔贝尔看来，一国社会物质上的繁荣将带来政府税收的增长，而这一繁荣和增长离不开一个得到有效管控的经济。这里的管控，一大重点就在于对本土产业发展和出口商业行为的鼓励以及对进口的限制，进而由此带来本国货币财富的积累。可以说，也许没有其他政治家能比柯尔贝尔更好地代表17世纪后半叶欧洲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和信条。在这一时期的法国，柯尔贝尔主义 (Colbertism) 就是重商主义 (mercantilism) 的代名词，尽管其更多还是实践性和政策导向的，理论色彩相对较弱。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于柯尔贝尔的经济思想与政策缺乏相对全面、深入的研究介绍。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互有关联的方面来解析柯尔贝尔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及实践。

## 聚敛金银货币财富的重商主义鸪的

在柯尔贝尔的国家治理宏大体系中，以贵金属形式存在的财富被视作国家繁荣和强大的唯一基础。在他看来，金银货币财富才是一国财产中最牢固和可靠的部分。柯尔贝尔认为，一国“一旦尊严和辉煌衰落，第一个表现便是货币的衰败”。为



柯尔贝尔曾任职财政总监督，在此职位上他实际上掌管了波旁王朝的全部内政事务，并致力于最大限度地促进法国的经济繁荣和财政收入增长。

此，他通过种种努力来避免和阻止货币外流，维护本国货币的稳定。整个17世纪里，法国一直在避免法币贬值方面不断努力尝试，但只有在柯尔贝尔时代才“取得了相对的成功”。根据伏尔泰的记载，在柯尔贝尔任内，一个银马克的兑换价格仅由其上任初的26法郎提高到27.28法郎，没有大的变化。

柯尔贝尔对于金银价值取向的崇尚和货币财富的追逐，与同时期的许多其他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相似，共同反映了随着17世纪欧洲城邦国家的衰落及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世纪宗教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藩篱约束已被冲破，而民族国家也构成了重商主义干预政策的基础。柯尔贝尔的货币财富思想为后世法国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攻击的标靶和建构对立理论的观照。重农学派的先驱人物、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比埃尔·布阿吉贝尔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一，他反对货币是财富的唯一或绝对形式的重商主义观点，认为金银货币及其积累是造成农业

凋敝、农民破产和社会罪恶的根源所在。

当然，重商主义这一概念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作为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对立面的重商主义进行大力抨击之后，才真正开始流行起来的。不过，作为后期重商主义的代表，柯尔贝尔的货币财富思想其实已发生变化，他开始以资本家的眼光来看待金银货币。确实，葡萄牙、西班牙等早期航海强国通过入侵征服、殖民劫掠和敲诈勒索而获得金银财富的做法，并不构成国家收入的可持续稳定来源，维持国民经济财富最好的办法还在于将金银货币投入到产业经济发展和商品生产流通中去，进而带来国家财政收入和人民货币财富的进一步增加。因此，对柯尔贝尔而言，贵金属的价值主要是作为再生产的手段而存在的，而不仅仅局限于其价值储藏或交换手段的基本职能。

与此同时，在柯尔贝尔看来，西欧各国流通的金银货币总量是一定的，要使自己国家的货币财富不断扩大，就必须

设法将别国手中的货币财富转移到本国来，一国只有以牺牲另一国的利益为代价才能变得更富有[(美)斯坦利·L.布鲁、兰迪·R.格兰特《经济思想史》，邱晓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通过扩展对外贸易实现金银货币的净流入，是柯尔贝尔给出的药方。并且，还需要通过依赖劳动力投入的生产制造业的发展让人民从这种货币的转移和财富的扩大中获益，同时实现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以增强国家能力，如此才能内生性地防止货币的外移。可以看出，这些货币思想与他的产业政策思想、对外贸易思想和财政税收思想均有着密切关联。

## 民族工业发展中的国家扩张与监管

在柯尔贝尔任职初期，法国国民经济中并无占据非常明显主导地位的民族工业，很多产品都要从其他国家购进。这显然与柯尔贝尔的经济民族主义设想是不相符的，1663年他在一份记录当时法国经济条件及其改革计划的备忘录中曾开宗明义地写道，“几乎所有伟大的国家，都在它的本国国土上通过各种方法实现了自我维持、自给自足，当然前提是这些方法得到了很好的实实在在的管理”(Arthur John Sargent, *The Economic Policy of Colbert*, Originally published 1899, Batoche Books, Kitchener 2004, p30)。在柯尔贝尔的经济蓝图中，法国要成为真正的伟大国家，也应致力在所有产品上实现自给，减少对进口产品的依赖，进而通过扩大出口在欧洲和全球市场中分一杯羹，这就必须创建和发展自己的工场手工业体系。

然而，当时的法国私人资本家普遍更倾向于充当国家债权人和包税人，不愿将资本用于从事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为了扭转既有制度安排下的激励扭曲，柯尔贝尔主导制定了对率先引入新产业的先行者赋予

一系列特权或资助的激励政策，如一定年限的垄断制造权或销售权、更多的政府补贴资助、税收豁免权、皇室荣誉冠名权等。1661年至1683年间，柯尔贝尔就利用国家力量创办了近50家享受税收豁免的大的皇家手工工场(鲁友章《重商主义》，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7页)，使许多奢侈品行业都得到很大发展，并在欧洲众国中建立起领先地位。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指出，柯尔贝尔去世之际的法国，“纺织机已经有五万架，每年丝织品产值已达五千万法郎”，“法国工业的全盛时代”是从柯尔贝尔开始的[(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6-67页]。无疑，强有力的封建王权与国家扩张，成为推动和扶持这个时期法国产业资本迅速发展的重要后盾。

与此同时，柯尔贝尔也非常重视运用国家力量对产品质量和规格实行严格的监管规制。1671年，一家法国制衣公司负责人曾就法国出口衣物低质问题向柯尔贝尔抱怨，指出这会影响到法国产品的国际声誉，认为政府应采取一些措施来纠正这些不良厂商的做法(*The Economic Policy of Colbert*, p32)。1673年，法国通过敕令形成了关于工场手工业管理的基本指导方针，从中央到地方设置了层层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和刚性纪律约束。以纺织品为例，如果达不到规定的经纱数及一定长度、宽度或重量，就会被视作违法，相关产品要被公开焚毁。如果再犯，对此负责的商人或工人还要面对行会全体人员接受斥责。在柯尔贝尔时代，普通纺织品至少须经过六道检查。当代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称许，柯尔贝尔主义“代表了一种从低水平的非生产的保税人和租地人向高水平的生产者的转变”。

当然，柯尔贝尔借助国家力量发展民族工业也带来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极大调整，